

清进士题名碑考述

江庆柏

摘要：立于北京孔庙内、镌刻有清朝全部进士姓名及甲第、籍贯的进士题名碑，是清朝重要的科举文献。本文讨论了题名碑的建立、规制、书写、改刊等问题，对题名碑的文献价值、题名碑的讹误等也作了分析。

关键词：清朝进士；题名碑；科举考试

中图分类号：K87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9)06-0007-06

清进士题名碑，是指立于北京孔庙内、镌刻有清朝全部进士姓名及甲第、籍贯的碑石。清朝所立进士题名碑共118碑，包括正科112碑，顺治九年、十二年两科满洲进士碑，乾隆四年、十年、十三年、十六年四科翻译进士碑。进士题名碑是清朝重要的科举文献。现就相关问题考述如下。

题名碑的建立

清制，新进士释褐，礼部具题，工部给建碑银一百两，交国子监立石题名。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卷85《国子监》云：“凡进士题名，每科进士诣学释褐后，移取工部库帑百两，按诸进士甲第先后，详其姓名里居，勒碑于戟门外。”乾隆《钦定国子监志》卷42《经费》亦云：“进士题名碑，赐银一百两，立石大成门外。由礼部奏请国子监行文工部营缮司支领，典簿厅经理其事。”一般认为，这一制度始于唐代雁塔题名故事。今北京孔庙内所见最早的进士题名碑，是元朝的。

关于清朝初年的进士题名立石，吴苑和清世宗各有说明。

吴苑《皇清进士题名碑记》云：

盖自顺治丙戌迄康熙辛未（三十年）为科十有八矣，然惟丙戌为龙飞首科，碑亭岿然壮丽，继此未及踵行。康熙二十六年御史疏言，请令本科进士见为京官，或其子孙在朝者立石，并刻殿试榜文制书一道于碑额，以彰国恩。上

俞已久，迄今数载未及鳩工。苑叨典成均，谊当董倡，因算石料工价书丹篆额之费，凡需白金若干两，告之在朝诸君子，莫不荐货以集。事经始于康熙壬申（三十一年），落成于康熙癸酉（三十二年）^①。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四日清世宗谕礼部工部：

国子监进士题名碑，始于唐时。新进士榜后，于慈恩寺塔下题名立碑。自宋明以至我朝，皆建碑于国学。按诸进士甲第先后，刻姓名籍贯于上，所以重科名也。今太学圣庙戟门外所立本朝历科题名碑，自顺治丙戌科（三年），至康熙戊戌科（五十七年）而止。考《会典》，诸进士释菜后，礼部题请，工部给建碑银一百两，交与国子监立石题名。康熙三年，辅政大臣裁省此典。其后每科皆诸进士捐资立石。我国家振兴文教，凡乡会试动用帑金数万。朕即位之始，即开恩科。诚以科目一途，实用人取士之本也。题名之典，岂宜遗缺。著工部动用正项钱粮，令国子监将雍正癸卯（元年）、甲辰（二年）两科题名碑，即行建立。康熙辛丑科（六十年）亦行补建。嗣后每科，礼部仍照旧例题请，庶士子观览丰碑，知读书可以荣名，益励其自修上达之志尔。该衙门即遵谕行^②。

从以上两段文字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清初题名碑建立的经过情况。清朝进士题名立石，始于顺治三年。此为清朝定都北京后，首次开科取士。至康熙初年一度停止，其后每科进士题名碑，并由进

收稿日期：2007-5-10

作者简介：江庆柏（1951-），江苏宜兴人。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研究员。现主要从事清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①《皇清文颖》卷20，《四库全书》本，第1449册，第732页。
②《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27，《四库全书》本，第414册，第228页。

士自己筹钱建立。雍正二年，在清世宗过问下，始恢复旧例，“嗣后每科礼部仍照旧例”。自此之后，进士题名碑由朝廷出资立石，成为定制。但清朝最后一科即光绪三十年进士题名碑，清廷已无力负担立碑银两，遂由进士自筹资金立石。

问题在于顺治三年以后至康熙初年这段时间所立的进士碑，是与殿试同步而立的，还是后来补立的。按照吴苑的说法，清朝进士题名碑只有顺治三年丙戌科是当时立石的，其后一直未能立石。进士题名立石似乎并未成为制度。但按照清世宗的说法，直到康熙三年，一直是正常在建题名碑的。谕旨云：“康熙三年，辅政大臣裁省此典。”所谓“此典”，即指“诸进士释菜后，礼部题请工部给建碑银一百两，交与国子监立石题名”这项制度。只是在康熙三年大臣议论后，这一制度才停止执行。

我认为，要查考立碑的具体时间，碑上的落款是最重要的依据。今查题名碑拓片，可见顺治四年碑末题云：“康熙三十一年岁次壬申仲秋谷旦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兼礼部尚书加四级宛平王熙捐资建立”。顺治六年碑末题云：“康熙四十九年八月初一日立石”（此科进士戴玄因缺末笔）。可见这些碑都是康熙年间建立的。关于这两座碑的建立时间，乾隆《钦定国子监志》卷48《金石》3“题名”也有如下记载：“四年丁亥科赐吕宫等二百九十八名及第出身题名碑，康熙三十一年补立。”“六年己丑科赐刘子壮等三百九十五名及第出身题名碑，康熙四十九年补立。”由此可见这两座碑并非当年所立。因此清世宗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关于康熙年间恢复建碑的事，吴苑和清世宗的说法没有太大的区别。清世宗说：“康熙三年，辅政大臣裁省此典。其后每科皆诸进士捐资立石。”吴苑说：“康熙二十六年御史疏言，请令本科进士见为京官，或其子孙在朝者立石，并刻殿试榜文制书一道于碑额，以彰国恩。”这种说法，在进士碑所题立碑者的姓名中，同样可找到根据。顺治十六年碑有题款作：

资政大夫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沁州吴璵
都察院掌院左都御史加六级蒋弘道
徐元文子翰林院庶吉士徐树本
姜宗吕子户部给事中姜櫛
李允登子陕西监察御史李先复
赵之符子吏部考工司员外赵珣
刘佐临刘壮国侄兵部督捕司郎中刘凡
崔崑子行人司司正崔岱齐
刘昌言子行人司行人刘愈
姚燮子云南鹤庆府通判姚策

翰林院编修姚士嵩

姚绶虞子翰林院待诏姚镶

康熙三十八年岁次己卯仲夏谷旦全建

题款所列诸人，吴璵、蒋弘道为顺治十六年进士，徐树本、姜櫛等则为该科进士徐元文、姜宗吕等子弟。显然顺治十六年碑是康熙三十八年由“本科进士见为京官，或其子孙在朝者立石”，即由当科进士及其部分子弟共同出资建立的。此碑既非当年建立，亦未使用礼部建碑银两。可惜大部分进士碑，特别是早期的碑都没有明确的立石时间，我们只能根据碑上文字的避讳情况，来判断其建立的大致年代。

题名碑的规制

题名碑由碑身、碑座两部分组成。关于题名碑的规制，吴苑《皇清进士题名碑记》有一段说明：

其碑用青白石。高八尺二寸，阔三尺，厚七寸五分。座高二尺，阔四尺，厚一尺五寸。皆与前制相准。

这是康熙年间立石时的标准。吴苑所说之尺寸，当指营造尺。换算成公制，即碑身高2624毫米，宽（阔）960毫米，厚240毫米。碑座高640毫米，宽1280毫米，厚480毫米^①。但事实上各朝各科所立之碑，其大小、形制并不相同。

今将本人量得的部分进士碑的尺寸列举于下：

科年	碑身（单位毫米）			碑座（单位毫米）		
	高	宽	厚	高	宽	厚
顺3	3200	1180	415	730	1460	960
康3	2070	950	235	470	1310	500
康24	1330	870	230	600	1280	460
乾1	1800	990	350	760	1360	760
乾25	1620	840	210	570	1070	570
光21	1570	800	215	极矮小		
光30	2260	850	270	720	1140	560

按：光绪二十九年碑与光绪三十年碑基本相同

从以上所列尺寸可以看到，题名碑碑身大小相差非常悬殊。清朝进士第一碑顺治三年碑是最高大的，确如吴苑所说，“岿然壮丽”。后来建立的所有碑都没有达到这一规模。乾隆二十五年碑则其高度和厚度都只及顺治三年碑的二分之一，还有比乾隆二十五年碑更矮小的。其次，即使是同一朝代的碑，其大小尺寸相差也很大，如乾隆元年碑与乾隆

^①营造尺1尺=320毫米，1寸=32毫米。参见《汉语大词典》附录《中国历代度制演变测算简表》，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第6页。

二十五年碑，光绪二十一年碑与光绪三十年碑。就是吴苑所在的康熙年间所立之碑，其大小厚薄尺寸也不统一，与吴苑所说的尺寸也有很大差距。吴苑所说的“皆与前制相准”，未知依据何在。题名碑碑座的差距没有碑身那么大，但尺寸也不统一。其中顺治三年碑碑座、乾隆元年碑碑座是最大的两座。

碑身分为三部分内容。碑额篆书科年，如康熙“己未科进士题名碑”等。科年下书写皇帝制诰一道。关于皇帝制诰，乾隆《钦定国子监志》卷48《金石》3“题名”顺治三年丙戌科注云：“明进士题名并命阁臣作记，重见复出，文义一律。我朝进士题名于篆额之下刊榜首圣制一道，于法为简质云。”题名碑制诰亦为程文，与小金榜卷首制诰文字完全相同。如顺治六年碑其文作：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顺治六年四月十二日策试天下贡士左敬祖等三百九十五名。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故兹诰示。顺治六年四月十五日。其下按甲第名次镌刻当科全部进士名单，自右至左分行书写。只有清朝进士第一碑，即顺治三年碑为自上至下书写，每一行十一人，并刻录了当年未参加殿试的三十名贡士的全部名单。这是与以后的碑不一样的。

题名碑的书写

清前期的进士碑，部分碑上有建碑年份。但这一时期的所有碑，都没有书写者的署名。道光后期以后所立进士碑，许多都有书写、立石、刻字人的署名。

石韞玉《乾隆五十六年进士题名碑跋》云：“故事，进士题名碑，即择榜中善书者书之。”^①按照石韞玉的说法，题名碑是由本科进士中书法佳者书写的。这或许是石韞玉那个时代的情况。不过由于这一时期的进士碑上都没有书写者的署名，而其它相关资料又极少，因此石韞玉的说法到底有多少准确性，无从考究。而从所见题名碑实际情况来看，并不完全如石韞玉所说。例如乾隆五十六年碑即由石韞玉书写。石韞玉虽是榜中进士，但自认为书法不好，“余书不工，国子官谬推余书丹刻石。”而之所以推石韞玉书写，无非因其为当科状元而已。

碑上出现书写者姓名是从道光年间开始的。从书写者题名可以看到，自此以后的碑几乎没有是当科进士所书的，而大都由国子监祭酒、或司业书写。如道光二十四年碑题“国子监祭酒吉明书”，道光二十五年碑题“国子监司业钮福保书”，咸丰三年

碑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南书房翰林兼署祭酒何彤云书”。此外，光绪元年碑由也是国子监司业的汪鸣銮书写，汪鸣銮是同治四年进士。光绪九年碑由国子监祭酒恩棠书写，而恩棠非进士出身。也有连续几科都有同一人书写的，如道光二十年、道光二十一年碑题“国子监祭酒花沙纳书”，同治七年、十年、十三年碑都有国子监祭酒宗室寶森书写。不过这种情况较少见。这一时期明确可知是由当科进士书写的，只有光绪三十年碑。碑由此科进士岑光樾书写，题“侍讲衔翰林院编修岑光樾书”。此碑书法极佳。

晚期的碑上通常还有立石、刻字人的署名。如道光二十年碑题“典簿裕贵、施善立石”，“赵大龄镌字”。道光二十一年碑立石人员同，另题“卢葆园刻字”。道光二十四年碑题“周洪源镌”。同治二年碑末尾还有这样一行字：“自己未以至是科俱广聚山厂勒石”。己未应为咸丰九年，即咸丰九年己未科、咸丰十年庚申恩科、同治元年壬戌科、同治二年癸亥恩科题名碑均由“广聚山厂”承办刻石。若对这些承办者进行研究，将对清朝官府与民间作坊之间的关系提供有用的资料。

题名碑的改刊

题名碑在书写和刻石过程中，难免会发生一些错误，这就有一个改正的问题。也有时候，因一些特殊原因，对已镌刻的碑文要作相应的改动。这些在碑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就笔者所见，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将原字磨去，另刻上新字。如乾隆二年碑制诰后所题时间，原作“乾隆二年五月初一日”，“五”字下掉了一个“月”字。后改作“乾隆二年五月初一日”。“月初一”三字即直接在原刻的“初一日”三字上改刻，并补刻一“日”字。改刻痕迹清晰可见。

如果漏列进士，原文已无法补上，就在另处补出。如乾隆三十一年进士卢嘉会，小金榜、《国朝历科题名碑录》（以下简称《碑录》）均作二甲第六十九名。今见题名碑在三甲最后一名进士李会之后。当是二甲漏列而后补刻者。

清朝进士经常有改姓、复姓的问题。这些改变，在《碑录》中常被注出，在题名碑上，有时也有说明，也有直接在碑石上改动的。如雍正元年进士沈韩，《碑录》云：“复姓俞。”今见题名碑，姓氏“沈”上叠刻了一个“俞”字。从字形上看，是原刻作沈韩，后改作俞韩。

避讳改名，在题名碑上也有所反映。如乾隆元年进士叶弘遇，“弘”字末笔，颇似刻后磨去，同

^①石韞玉《独学庐二稿》卷下，《独学庐全集》本，第22页。

科进士黄弘之“弘”字缺末笔非常清楚。同样康熙三年进士李胤枫，“胤”字缺末笔。所缺末笔，也颇似后来磨去，而非刻石时就缺者。

不过也有些改刻似乎没有多少根据。例如乾隆十七年进士陶其悛，题名碑作陶其情。然细核拓片及原碑，可以看到其人名作过修改，名字下一字似先刻作“悛”字，又改刻成“情”字。查小金榜、乾隆《建昌府志》卷29《选举表》、乾隆《南城县志》卷7《选举志》，均作陶其悛。《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19册有其乾隆二十九年十月初一日自撰履历折，亦称“臣陶其悛”（第32页）。未知题名碑何以要将人名改刻。

题名碑的文献价值

“廷试有录，以示中外；题名有碑，以垂永远。”^①此语虽出于明人之口，也说明了树立题名碑的意义。康熙二十四年进士陆肯堂在《国子监题名碑记》中也详尽地述说了太学立进士题名碑的意义。陆肯堂认为，天子开科取士，广收天下贤才，而又题名立石，将使中式进士“耸惕震栗，感激奋兴”，同时感到惊惧。因此书石饬之，有“作兴劝戒”之义^②。

题名碑的文献价值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价值是有助于进士名录的校订。《国朝历科题名碑录》是我们今天考查清朝进士的基本资料。但由于各种原因，《碑录》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漏列或误列。这些问题往往可据题名碑予以补正。如：顺治十六年二甲进士，题名碑有王恭先1人，为第78名。《碑录》缺此人。经查雍正《山西通志》卷71《科目》著录其人，卷139《人物志》有其传，略云：“王恭先，临晋县人。顺治辛卯恭先果举山西第一，己亥成进士。授河间府推官缺，裁补崇明知县。”查乾隆《江南通志》卷108《职官志》“崇明县知县”记云：“王恭先，临晋人，进士。康熙七年任。”是王恭先为顺治十六年进士无误，而《碑录》则漏列了此人。

清朝进士题目文献中的一些姓氏人名错误，也可据题名碑等予以校订。如雍正二年三甲第168名进士，《国朝历科题名碑录》作余圣言，雍正《广东通志》卷35《选举志》及今人所编《广东历史人物辞典》作余圣言。乾隆《海丰县志》卷5《选举志》、道光《广东通志》卷77《选举表》“进士”作余圣言，而“举人”则均作余圣言。考题名碑正

作余圣言，再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可以肯定作“余圣言”者显系“余圣言”之误。又如道光十二年三甲第77名进士，题名碑作杨晓昀，《国朝历科题名碑录》作杨晓昀，《明清进士题目碑录索引》亦同《碑录》。考小金榜、《道光十二年壬辰恩科会试题名录》、《道光十二年壬辰恩科殿试状元翰林金榜题名录》等均作杨晓昀。“昀”用以指日光，“昀”用以指目光。杨晓昀字霁卿，号春野，与“昀”义相关。是《碑录》等有误。题名碑这方面的校订价值很大。

题名碑亦有助于人物籍贯的著录考订。如光绪九年进士胡景桂，《碑录》作直隶广平府永平县人。按：广平府无永平县。小金榜、题名碑作直隶永年县人。《光绪九年癸未科进士登科录》、光绪《永平府志》卷11《选举表》、《词林辑略》卷9均作永年县人。其会试卷履历云：“直隶广平府永年县拔贡生。”^③

题名碑还被其它进士题名文献作为著录进士的重要依据。如清孙桐生辑、清赵增荣重辑《国朝全蜀贡举备考》“例言”即称：“编中姓名按太学题名碑甲第名次详载。”即以清题名碑作为自己著书的依据。又如顺治朝广东进士李士璞，雍正《广东通志》卷35《选举志》作顺治十五年（应为十六年）己亥科徐元文榜进士，道光《广东通志》卷77《选举表》作顺治十八年辛丑科马世俊榜进士，其注云：“潮州《志》、揭阳《志》作戊戌（顺治十五年）进士，郝《志》（按：即郝玉麟修雍正《广东通志》）、普宁《志》作己亥（顺治十六年）进士。今依题名碑。”李应甲，雍正《广东通志》卷35《选举志》作顺治十七年（应为十八年）辛丑科进士，道光《广东通志》卷77《选举表》作康熙三年甲辰科进士，其注云：“见题名碑。潮州《志》、潮阳《志》作辛丑进士。”可见道光《广东通志》均以题名碑为进士科年著录的标准。

题名碑同时也是文献整理的基础。如《光绪顺天府志》卷115《选举》1“小序”云：“立表四……次进士，以题名碑为主。”即是说，此志中的进士表，是根据题名碑来整理的。清王庆云写《石渠余纪》中“清朝进士授官中额”一条时，其统计清代各朝所取进士的名额，也采用了《科场条例》中的数据。之所以采用这组数据，其理由就在于《科场条例》“照题名碑，较得其实”。且“今国学题名具在”，容易核对^④。

①明杨士奇《东里文集》卷1《宣德二年进士题名记》，《四库全书》本，第1238册，第12页。

②陆肯堂《国子监题名碑记》，《皇清文颖》卷20，《四库全书》本，第1449册，第733页。

③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54册，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1992年，第213页。

④王庆云《石渠余纪》卷1，清光绪十六年龙璋刻本，第38-39页。

题名碑还有空行，也值得注意。据《碑录》所记，宋鸿为康熙十二年三甲第23名进士，今见题名碑拓片上已无其人，但其所在位置仍在。从碑上可以看到，第22名汪鹤孙后空出一行，直接第24名张念仲。宋鸿为进士，亦见孙寶田纂修《旅大文献征存》卷2《选举志》，云：“宋鸿，金州卫人，康熙癸丑科进士。”既为进士，何以进士碑上不见其人？这或与宋鸿曾事耿精忠有关。《旅大文献征存》卷2《杂记》下“推官”记道：“宋鸿，清金州卫人，康熙癸丑进士。因事靖南王耿精忠，精忠谋反，康熙二十四年降鸿为浙江都司右卫经历。”因为这一原因，进士碑上遂不见其人。那么是立碑时即未列其人，还是后来将其铲去的呢？因原碑已完全无法识读，只能就拓片来看。经反复辨认，我认为是立碑时即未列其人。这不是没有可能。如上文所述，清朝进士题名碑始立于顺治朝，至康熙三年议停。后到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始重新立石，而全面补立康熙碑，则是雍正年间的事了。耿精忠“谋反”在康熙十三年，康熙二十四年宋鸿降职，这些都在重新立碑之前。考虑到这些因素，在立碑时就除去其人了。而之所以又在碑上空出一行，我想这两方面原因。一是宋鸿毕竟是进士出身，其名次是确定的。二是如果不空宋鸿一行，则宋鸿以后的进士名次均要上提一位，而这与各人实际名次又不符，且三甲进士总数上也要少一位。虽然这种空行现象是非常罕见的，但也为我们研究题名碑制碑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题名碑的讹误

题名碑虽可大量纠正其它题名文献的讹误，但其自身的讹误也不少，且越到后期，讹误也越多。试举例如下：

姓氏误。如嘉庆十四年进士栗作贡，广西临桂人，题名碑误作栗作贡。按：光绪《临桂县志》卷5《选举表》作栗作贡。栗作贡嘉庆二十五年任山东临邑知县，见道光《临邑县志》卷7《职官志》。清代临桂县栗氏考中进士者，还有栗千锺、栗穗、栗增焄。

名字误。如嘉庆六年进士杨廷英，题名碑作杨廷英。按：《嘉庆六年辛酉恩科进士登科录》，光绪《龙岩州志》卷11《选举志》、卷12《人物志》本传，《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24册所收其嘉庆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自撰履历折等，均作杨廷英。杨氏嘉庆十九年任山西虞乡县知县，查民国《虞乡县志》卷7《官师表》，也作杨廷英。题名碑因英、英形近，且英作人名少见而误。题名碑中像这类进

士名字因字形相近而产生的讹误不少。题名碑的这些讹误，有的还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一些相关著作，如人们常用来查找清代进士的工具书《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就深受其影响，并因此产生了一些相同的讹误。

籍贯误。如乾隆七年进士黄冈竹，题名碑作江西新安人。按：江西无新安县。《乾隆七年壬戌科登科录》作江西省建昌府新城县民籍。黄冈竹见光绪《江西通志》卷32《选举表》，亦见同治《新城县志》卷8《选举志》著录。是题名碑新安人为新城人之误。《碑录》亦误作江西建昌府新安县人。又如道光二十一年进士蒋达，题名碑作广西桂林县人，亦误。清无桂林县之设。《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恩科登科录》作广西桂林府灌阳县人，是也。蒋达父亲名作梅，嘉庆元年进士，题名碑著录其籍贯正作灌阳县。

著录同科进士有重出者。咸丰九年进士，徐光祖一见三甲第23名，又见三甲第71名。前者为徐光祖不误，见《碑录》。后者为周光炯之误。周光炯见《咸丰九年己未科会试同年齿录》、宣统《甘肃新通志》卷39《历科选举表》。又如同治十三年进士，赵尔震一见二甲第39名，又见三甲第177名。前者为赵尔巽之误。赵尔巽为赵尔震胞弟^①。夷良《清史馆馆长前东三省总督盛京将军赵公行状》云：“甲戌，与兄工部公同成进士，同入翰林。”^②即指同治十三年甲戌科赵尔巽与其胞兄赵尔震（赵尔震官至工部郎中，故称工部公）同科考中进士一事。题名碑人名重出。

个别科年的题名碑著录显得过于粗疏，明显的标志是籍贯可以注出县名而未注。如道光三年进士鲍俊、李品芳、徐应照、范公辅、朱奎廷、蔡发甲、林士傅等，道光十三年进士黄赞汤、许榑、林廷禧、杜宝辰、王树滋、谭廷襄、陈芝龄、林上砥等，均只著录省府两级，而未能注到县。这些进士《碑录》亦未注出县名，也是《碑录》的粗疏。

从总体上来看，清后期的进士碑讹误要明显多于清前期的进士碑。如咸丰十年碑，赵亮熙误作赵良熙，欧寿榑误作欧阳榑，沈源深误作沈源琛，李德洞误作李德河，张恩煦误作张恩照，何庆恩误作何恩庆；同治七年碑，乔駿误作乔骏，陈惺驯误作陈星驯，岑傅霖误作岑传霖等。即是。再如同治十三年碑中，两宗室进士良贵、奎郁均未依例标注“宗

^①见同治十二年赵尔震乡试卷履历，《清代朱卷集成》第110册，第175-182页。

^②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65册，线装书局，2003年，第79页。

室”字样，赵尔震人名重见，王蘊拆字作王才鼎，胡瀛生又掉字作胡瀛，等等。上述道光三年碑、道光十三年碑著录进士籍贯多粗疏，也说明了这种情况。从书法上看，清后期的进士碑极其端正匀整，具有很高的观赏性，而差错之处则明显多于前期的进士碑，这可能与清后期廷试中过于偏重书法而轻视文章内容做法有关。

如上所述，题名碑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它毕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而且是相当完整的进士题名文献。如此完整的整整一个清朝的进士题名，除了

《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外，尚找不到第二份。可惜这些题名碑在清代科举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还远未被人们充分认识，一些论著或多或少忽略了这一重要文献的存在；一些考订清朝进士题名的论著，多留心于纸质文献，而未能认真研究题名碑的内容，从而准确、合理地使用这部分资料。这与题名碑自身今天已基本不可辨识，只有利用拓片才能阅读，因此使用较为困难有关，与人们对题名碑价值认识的不足有关，也与很少有人能认真通读题名碑有关。

Researches of the Superscriptions on the Stelae for Qing's Jin-shi

JIANG Qing-bai

(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stelae with names, ranks and birthplaces of all Qing's Jin-shi in Beijing Confucious Temple accounts for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e documents about Qing Dynasty's imperial examination. This essay refers to questions on the establishment, standards, scribbling and revisions of the stelae. Additionally, it has made some analysis on the stelae's documentary value and successive mistakes.

Key words: Jin-shi of Qing Dynasty; stelae; Imperial Examination

(责任编辑: 黄云鹤)

(上接第 34 页)

可见从传意的角度来看，任何经典注释活动都是一种主客观相统一的传意活动，不同注释目标所形成的注释结果的差异只是主客观程度上的差异。我们从传意的角度分析古代不同学派的注释评论时，应当从被评者的注释文本出发，从被评者的学术背景、注释的标准、注释的方式等方面全面分析以断定古代注释评论的恰当与否，以免受前人之论的影响对注释历史、注释风格与特点的认识造成不当。如一个时期以来，由于注释研究所确定的注释评论的标准不清，一些学者在进行注释史的划分时有分 4 阶段的，有分 5 阶段的，有分 6 阶段及 7 阶段的^①。在进行注释评论时，或是站在清代汉学的立场上评价历史注释而有抑宋扬汉的显著倾向，认为宋元注释是衰落期的注释；或是站在宋人立场上评论唐代注释为保守性的注释。我们以为，对注释文本的特点、注释风格或是某一时代注释历史进行评论时，一方面应当从注释文本和注释历史的实际出发进行细致的分析与讨论；一方面应当本着客观、公允的态度，对一注释文本或一阶段的注释风格、注释历史予以恰当评价，而不能完全被前人的某种注释评论所左右。

The Object and Essence of Classics Notation

DU Min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062)

Abstract: Classics not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ass on the classics's values. Classics notation action is make up of two stages of comprehension and annotation. Because of the diffencence of classics notation objects, it had formed many kinds of effection and commentary. According to subgetctivity of classics notation object in historical period, classics not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kinds: subjectivity, objectivty and vinculum of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ty. The establishment of every kinds of classics notation object, must based on the animadvertion and negation on the previous generation's works. Classics notation action is an unification of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but has difference in degree.

Key words: classics notation; the cummunication of classics; objects of classics notation

(责任编辑: 石磊)

^①杜敏《论经典注释传意的客观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6期。